

朱彝尊与清初的访碑活动

王 坤

(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十七世纪中叶,明清朝代更迭带来社会的动荡和文化氛围的变迁,新的学术方法和观念随之产生。以金石、考据为特色的实学运动风起云涌,在此背景下产生的“访碑”活动令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清初的著名学者朱彝尊便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对于访碑所得碑板的研究是其金石学工作的重要内容。《曝书亭集》中关于访碑、读碑的文字是研究朱彝尊学术活动的重要材料,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读碑、考据的心得体会,如实反映了一个学者、士大夫的活动和感受。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对于新的学术方法的尝试,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新观念,对于研究十七世纪文化史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朱彝尊;金石学;访碑;考据;《曝书亭集》

中图分类号:J2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6)05-0131-05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作为清初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他在经学、史学、文学上均有非凡造诣,不仅留下了《经义考》、《明诗综》这样足以彪炳一代的巨著,并且是以金石文字证史的新学风的开创者之一。有关朱彝尊金石学活动的主要研究散见于近年来一些讨论十七世纪书法史的专著,如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谈到朱彝尊参加的访碑活动和他对隶书的一些见解^[1],薛龙春在《郑簠研究》中多处论及朱彝尊与郑簠的交往交流和清初文人圈的学术活动^[2]。本文拟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在清初的学术背景下对朱彝尊的访碑活动做一梳理,从中观察十七世纪金石学的发展方向和轨迹。

一、清初的学术氛围和朱彝尊的交游圈

朱彝尊一生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其故乡的文化氛围和其家庭的熏陶。秀水今称嘉兴,位于太湖以东长江三角洲的杭嘉湖平原。太湖地区风景如画,人杰地灵,是明清时期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和文化、艺术中心。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关系更为密切的是,自明季以来,这里就活跃着一批实力雄厚、眼光独到的收藏家。在他们当中影响较大的有朱彝

尊的同乡耆宿项元汴(1525—1590)和李日华(1565—1635)。朱彝尊家族与项氏为世交,其《〈项子京画卷〉跋》云:“予家与项氏世为婚姻。所谓‘天籁阁’者,少日屡登焉。”^[3](P565)

对朱彝尊的成长有着更直接影响的是其家族。朱彝尊曾祖父朱国祚(1559—1624),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第一,历仕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追赠太傅^[4](P456),是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朱国祚一生勤劳国事,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在其熏陶之下,朱氏子弟均怀有深切的忧患意识。朱彝尊嗣父朱茂暉,是明末重要文人社团“复社”的核心成员之一,一生致力于反对宦官专权、改革弊政、兴复古学。朱茂暉无子,以弟茂曙长子彝尊入继为嗣^[5](P16—18)。朱彝尊生父朱茂曙,秀水县学生,卒后门人私谥为“安度先生”,亦与复社关系密切^[4](P713)。家庭背景注定了朱彝尊一生对家国命运的关注,而对于清初的士人来说,这种关切在思想文化层面主要表现为对当代学问的反思和对古代学术的追求。

明清朝代鼎革给学术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关于明清学风之嬗变及影响,余英时在《从宋明儒学的

收稿日期:2016-07-25

作者简介:王坤,女,哲学博士,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讲师。

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中有深入的阐述^[6]，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有独立的章节讨论十七世纪学术和艺术的新趋势^[1](P196—208)。清初汉族士人反思明朝覆亡的惨痛教训，认为明代占统治地位的“心学”空谈心性，是导致亡国的根源。针对“心学”的弊病，人们提出以扎实的考据为特色的“朴学”或“实学”主张。学者们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竭尽所能地校勘辨伪、注疏考证。他们对于材料的关注已不局限于文献典籍，也扩展到传世器物 and 出土碑铭。由于学术风气的转变，新的学术方法随之产生。在清初这场金石、考据独领风骚的学术运动中，朱彝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顺治七年(1650)，江浙士人聚于嘉兴南湖，许多名士应邀与会，称“十郡大社”。在这次集会上，朱彝尊与吴伟业(1609—1671)、尤侗(1618—1704)、毛奇龄(1623—1716)等人相谈甚欢，结为好友^[5](P46—47)。也大约在同一时期，他的才华引起了曹溶(1613—1685)的注意。曹溶，字秋岳，一字洁躬，与朱彝尊同为秀水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仕明为御史，明亡后降清。曹溶工诗文，酷爱藏书，精于书画鉴赏，在金石学上亦有相当造诣，曾将所见碑帖辑为《金石录》一卷。他不仅与朱彝尊在金石和收藏上志同道合，并且为其早年的交游活动提供了许多便利。

广泛的游历开阔了朱彝尊在学术上的视野。顺治十三年(1656)，他被广东高要知县杨雍建延聘为塾师，于是年夏赴粤^[5](P66)。此时，曹溶正在广东左布政使任上^[7](P1768)。在广东期间，二人往来十分密切。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对这段交往曾有回忆云：“彝尊忆壮日从先生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地，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又称赞曹溶云：“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8](P255)因曹溶的关系，他在广东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著名者如番禺籍诗人屈大均(1630—1696)。

朱彝尊客居广东两年后于顺治十五年(1658)归家。第二年，江南发生“通海案”。事后，清廷大加追查“通海”事件，江南民众惶惶不安。康熙元年(1662)，朱彝尊好友魏耕因此案被捕，不久被杀于杭

州^①。为躲避牵连，朱彝尊被迫再次离家，直至次年其父朱茂曙病危才匆匆赶回秀水^[5](P123)。处理完父亲丧事后，因时局所迫，他决定远走山西，再次投奔好友曹溶。

十七世纪六七十年代，江南战祸频仍，山西以其深处内地，环境相对安定。许多南方士人避祸于此，于是山西暂代江南成为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1](P191)。在山西，朱彝尊得到曹溶的热情款待和照拂。经曹介绍，他结识了盛名卓著的文人领袖顾炎武(1613—1682)和傅山(1607—1684)。

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清军攻陷昆山时，其母王氏绝食殉国，顾炎武深受触动。他多次拒绝仕清，一生以“遗民”自居。他将晚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论证心学的谬误，并对以实证为本的“朴学”大加提倡，其《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论及明朝覆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心学”的清谈^[9](P402)。为给自己的主张提供更多依据，他不遗余力地寻找新鲜且可靠的材料，金石拓片成为他搜集学术资料的重要来源。顾炎武编有《金石文字记》，收录拓片300余件，书中涉及他与朱彝尊关于金石文字的探讨^②。

在山西期间，朱彝尊与傅山的交往对他的学术生涯也有直接影响。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不仅是声誉甚籍的学者、思想家，在艺术和医学上也均有造诣。与顾炎武一样，他在明朝灭亡后也拒绝入仕新朝，把满腔热情投入到“实学”当中，在考据、金石、音韵等学问上用力尤深。

阎若璩(1636—1704)也是当时山西文化圈中引人注目的一员。阎若璩，字百诗，江苏山阳人，祖籍山西太原。他幼习经史，很早就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在《尚书古文疏证》这部著作中，他考证出千百年来被儒家学者奉为圭臬的《古文尚书》实系伪作。这一惊人论断极大地撼动了新儒家的理论基础，在学术界引起一片哗然。朱彝尊对《古文尚书》也抱有极大兴趣。他在《尚书古文辨》一文中对不同版本的《尚书》作了比对，对以往的学术成果做出了回应^[3](卷五十八，P587—589)。

从江南到山西，清初的学术圈中好古和复古已

① 朱彝尊在为朱士稚所作《贞毅先生墓表》中提到：“先生既免系，放荡江湖，间至归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溪迁于归安者也。”又说：“又明年壬寅六月朔，二人坐惨法死。”“自慈溪迁于归安者”即魏耕，“坐惨法死”指其因“通海案”被杀。此事对朱彝尊震动很大(见朱彝尊《曝书亭全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页)。

② 如《金石文字记》卷五《李克用题名》中，顾炎武引用了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十《唐北岳庙李克用题名碑跋》中关于此碑的评论；同卷《天龙寺千佛楼碑》，引用朱彝尊《北汉千佛楼碑跋》之论述。

成为主流,回归原典成为学者们普遍的努力方向。正是这样的学术氛围,为隶书的复兴提供了最佳的时机。与其他倡导实学的学者们一样,朱彝尊在学术上追求一丝不苟的追本溯源,不遗余力地搜集金石拓片以为考据的实证。

二、《曝书亭集》中记录的访碑活动和朱彝尊的金石学研究

如前文所述,清初学术风气的变化带来了金石学的兴盛。对于古代器物、碑刻的研究为考据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可作为对文献的补充,因此备受清初学者的重视。为获取更多古代碑刻,学者们经常遍访古迹,搜集摹拓,这一活动称为“访碑”[1](P215-227)。顾炎武就是访碑的倡导者之一。在其《金石文字记》序言中,他说道:

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扞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余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10](P28-29)

对于访碑,朱彝尊与顾炎武有着同样的热情,他的访碑活动在其《曝书亭集》中多有反映。

(一)朱彝尊的访碑行踪

明清以前,山西和山东曾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保存了大量古代碑铭,成为访碑者的必游之地。朱彝尊在山西盘桓三载,寻访了多处古代碑刻并对它们做了深入研究。康熙四年(1665),他随曹溶一道前往太原,于八月间拜访了傅山。傅山向他们展示了其所藏《尹宙碑》等珍贵拓片。朱彝尊观后记录了其状态,称《尹宙碑》“土中晚出,文字尚完。结体遒劲,犹存篆籀之遗。是本烟楮悉旧,对之如百年前物,尤为尽善”[3](《书〈尹宙碑〉后》, P513)。曹溶在观摩后也给予很高评价,并由朱彝尊书于其后。九月,三人一同前往山东汶上县,在那里找到了《衡方碑》。此碑曾著录于宋代赵明诚(1081—1129)的《金石录》。由于未经反复椎拓,保存较为完好,大部分字迹清晰可读[3](《〈衡方碑〉跋》, P508)。

康熙五年(1666),朱彝尊被山西布政使王显祚

聘为幕僚,继续留在太原[5](P141)。稍有余暇他就外出游历,访晋祠,登天龙山,过风峪,下徐沟、祁县,过代州,游交城,入汾州[5](P140-150)。所经之处有碑刻便驻足观摩,悉心研究。如是年秋,他路经汾阳县北七十里之郭社村,远见山上有碑额微露,便设法上山观看。果寻见一碑,碑文骈俪,言辞优美。可惜由于年深日久,文字剥蚀严重,人名已不可读,仅能从只言片语中判断此碑为一郭姓官员而立,岁在唐乾封二年(667)[3](《〈唐郭君碑〉跋》, P521)。

康熙六年(1667),朱彝尊离开太原,前往大同,寄居在曹溶府中。在曹家,他得以亲见其丰富的碑帖收藏,并时常与曹溶一同外出访碑。《曝书亭集》中提到了《唐李諲妒神颂碑》,据朱彝尊题跋,此碑出于平定州娘子关,被发现时已于荒草丛中伫立千载。井陘西南、太原东北有水以妒神名之。妒神者,春秋时晋国大臣介之推妹。碑立于唐大历十三年(778),游击将军上柱国李諲为之撰文。对于祭祀妒神的风俗,朱彝尊颇为困惑。因其未见于著录,故椎而拓之,悉心收藏[3](《〈平定州唐李諲妒神颂〉跋》, P526)。

在离开山西返回家乡之前,朱彝尊前往北京、山东等地探友访碑,盘桓多日。在北京,他与友人谭舟石一同拜会了著名的收藏家孙承泽(1592—1676),观碑拓于砚山书屋[3](《书〈王纯碑〉后》, P512)。孙承泽所藏拓片著录于《闲者轩帖考》,凡三十八种,成书于其后的《庚子销夏记》有所增补。

在山东,最吸引朱彝尊的是曲阜和济宁的碑刻。康熙八年(1669)春,朱彝尊由水路抵达任城,系舟城南,徒步行至州学,见五块汉碑立于仪门。其上字迹多已漫漶不清,无奈只得离去。第二年冬,当他与顾炎武、陆元辅(1617—1691)一同拜访孙承泽时,在孙家竟得见此碑拓本,并由此解决了考据上碰到的一些问题[3](《〈郎中郑固碑〉跋》, P512)。

在回乡处理双亲丧仪之后,朱彝尊于康熙九年(1670)再次北上。在由济宁前往北京途中,他观看了对他本人书法风格影响最大的《曹全碑》(应该是拓本,因碑在陕西),对此碑书法的秀美灵动赞叹不已。两年后,终于在北京慈仁寺市场上购得此碑拓片。此时,他已对此碑的保存状况有所担忧,因“石已中断,完好者且漫漶矣。更历数十年,必又叹此碑为难得”[3](《续题〈曹全碑〉后》, P510)。

朱彝尊对访碑的兴趣直到晚年也未稍减。康熙三十一年(1692),他自南昌至赣州,在储潭庙访得二唐碑,正反面均有镌刻,正面为裴諲之诗,背面为裴氏族入题记。十年之后,其友人吴江人张尚瑗拓裴

誦诗见赠,但因拓工不知其阴面有字,故仅推拓一面,令朱颇为遗憾^[3]《唐儲潭庙裴誦〈喜雨诗碑〉跋》,P525)。

在朱彝尊所处的时代,访碑活动已成为当时文人的时尚,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能遇到醉心于此的同道。康熙二十年(1681),朱彝尊任江南乡试主考。试毕,与好友郑篔(1622—1693)、王翬(1633—1717)、周筮(1623—1687)、曹彦枢,及其弟朱彝玠同游上元县摄山,于佛寺中访得唐《明徵君碑》。明徵君即南朝梁处士山宾,其后人明崇俨在唐高宗、武后时期为官,以术士著称,深得帝后信任,故立碑以纪念其祖先。朱彝尊一行对这一意外发现显然十分惊喜,“各拓一通以归”^[3]《跋〈唐明徵君碑〉》,P522)。

(二)朱彝尊对拓片的研究

朱彝尊所见的石碑拓片多著录于《曝书亭集》,其来源是多样的。首先,来自访碑活动。除上述一些有纪年的碑拓外,集中还提到《韩勅孔庙前后二碑》、《魏封孔羨宗圣侯碑》、《唐太宗晋祠碑》等^[3]《〈汉郃阳令曹全碑〉跋》,P510)。这些碑多保存于孔庙和州县学中,也有一些散落郊野。通常情况下,年代越久远的碑越受重视,保存状况也越好,盖与世人嗜古心态有关。其次,朱彝尊所见的一些拓片来自朋友的收藏。在其朋友圈中有不少金石藏家,他们经常聚会切磋,朱彝尊也时常被邀请为友人的收藏题跋。如曾任江苏巡抚的宋莘是一位活跃的收藏家。二人可能因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结缘,宋莘经常邀朱彝尊至家中观摩其收藏。《曝书亭集》中收录的《跋汉华山碑》、《唐张长史郎官石记跋》等均为宋莘所作。又如另一位收藏家潘耒(1646—1708),也经常见于朱彝尊的题跋。朱彝尊在《潘氏家藏晋唐小楷册跋》称潘耒“博访金石文”,得之则“一一装界”^[3]《潘氏家藏〈晋唐小楷册〉跋》,P520)。《后周幽州刺史赠少保豆卢恩碑》、《唐漳州陀罗尼石幢》和《唐济渎庙北海坛置祭器铭》等均为朱彝尊在潘家所见。第三,朱彝尊虽不甚富有,但一遇到市场上心仪的碑拓,立即出资购买。如《唐郎官石柱题名跋》中朱彝尊自述此帖来历云:“康熙戊子,予始购得郎官题名三纸,字已漫漶,眼昏莫辨。会桐城方生来自京师,访予梅会里,坐曝书亭,镇以界尺,审视之。姓名可识察者,三千一百余人。别录诸格纸,而同里曹生复以所拓本赠予。”^[3]《〈唐郎官石柱题名〉跋》,P527)另外,还有一些拓片系得自友人馈赠。如《吴宝鼎砖》,原有两块,为顾肇敏所得,分其一赠朱彝尊。朱彝尊将其推拓后,与之前所拓孔庙“五凤二年”及“甘泉”瓦当一起装裱成册^[3]《跋〈吴宝鼎砖字〉》,P514)。又如《唐济

安侯庙二碑》,康熙四年(1665)得自华州一友人;《唐儲潭庙裴誦喜雨诗碑》则得自吴江张尚瑗。

访碑是朱彝尊一生的嗜好,他所留下的众多关于访碑的题跋和笔记是其学术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山西期间,他将自己访碑所得的素材辑为《吉金贞石志》,与其后所得一起并入《曝书亭集》。这些题跋和笔记按其所讨论的器物、碑刻的年代编排,讨论的内容涉及金石文字的考证、拓片的来源、对碑文书法的评论等。

金石文字为朱彝尊的考据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他认为,过去学术上的许多谬误皆源自学者对材料的来源缺乏审慎的态度。他在《跋石淙碑》中写道:“予性嗜金石文,以其可证国史之谬。”^[3]《跋〈石淙碑〉》,P522)针对史料中存在的矛盾乖违,他指出:“生斯世者,其闻见已不能悉真,况百世之下,宁免传闻异词哉!惟金石之文,久而未泐,往往出风霜兵火之余,可以补旧史之阙。此好古之士,穷搜于荒厓破冢之间,而不惮也。”^[3]《〈唐北岳庙李克用题名碑〉跋》,P531)又强调碑刻文献对于证史的重要性,认为后世史家“传闻失真,要当以碑为正也”^[3]《〈汉郃阳令曹全碑〉跋》,P510)。

朱彝尊对于碑的研究不仅限于考据,他所留下的关于书法的论述多与所见汉碑的书法相关。在《尚书宣示帖跋》中他谈及自己对隶书的总体认识:

古文造自仓颉,篆创自史籀,破自李斯,隶始程邈,八分肇王次仲,章草原于史游,行书起刘德升,飞白擅蔡邕,草变于张伯英。唐张怀瓘言之详矣。独于真书不举作者姓氏,盖以隶为真也。然洪适以八分称隶,学者未尝议其非,不得举隶而遂遗真书也。钟太傅八分,有《受禅碑》,余多真书。王丞相导爱之,以《尚书宣示帖》衣带过江。今之传本,出于王内史所临,而《奏捷》、《墓田》、《荐季直》诸帖,均为世重。王僧虔赏其婉媚尽妙,陶弘景许以绝伦,庾肩吾品其天然第一,顾《魏志·本传》无片言及其善书,何与?窃疑汉代无真书,工之,自太傅始。当时楷法虽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晋帝王方用正书,见于襄泉注《述书赋》,而卫夫人图笔阵,有‘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之语,然则真书当别标一目,未可牵混入隶之一门也。^[3]《〈尚书宣示帖〉跋》,P514)

朱彝尊自己长于隶书,也对隶书有深入的思考。康

熙三十九年(1700),他与宋莘同观长垣本《汉华山碑》拓片。在题跋中,他将汉隶划分为三个类型:

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整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是已。一种流丽,《韩勅》、《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孔彪》、《孔佃》诸碑是已。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是已。[3]《跋〈汉华山碑〉》, P509)

他推崇汉隶,将其作为自己书法追求的目标。对于自己早年学习的唐隶,他多有批评乃至抱怨。如在为宋莘(1634—1714)所临《曹全碑》卷的题识中,朱彝尊写道:“余九龄学八分书。先舍人授以《石台孝经》。几案墙壁,涂写殆遍。及壮,睹汉隶始大悔之,然不能更而古矣。”[11](P196)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汉隶和唐隶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开元太山铭跋》中又谓:“御书遒劲,若怒猊渴骥,羁束安闲,不比《孝经》之多肉少骨。若唐隶尽如此,何惭汉碑碣乎?”[3]《〈开元太山铭〉跋》, P523)可见在他心目中,唐隶多不如汉隶,其原因在于缺乏活力,妍媚有余,多肉少骨。

在朱彝尊看来,艺术成就不是评判碑板的唯一标准,他对于石碑纪念的对象、石碑制作者的品行都有所关注。如在《曹全碑跋》中,他对曹全的高尚品格格外推崇,称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难能也”[3]《〈汉郃阳县令曹全碑〉跋》, P510)。在《宋京兆府学石经碑跋》中,他对刻工安民“以一石工,独能严邪正之辨,不肯镌名姓于碑”的义行大加赞赏,感叹道:“匹夫之志不可夺如是夫!……立身行己,不可不为后世虑。苟是非得其正,虽百工技能之人,反有荣于当时之士大夫者。呜呼!可感也矣!”[3]《〈宋京兆府学石经碑〉跋》, P535)

总之,访碑是清初书坛具有典型意义的活动,在当时风靡一时,对后世影响深远。朱彝尊作为清初士人中的杰出代表,不仅积极参与其中,并且留下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曝书亭集》中关于访碑、读碑的文字是研究朱彝尊学术活动的重要材料,其中包含了许多他关于读碑、考据的心得体会,如实反映了其作为学者、士大夫的活动和感受。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对他所处的时代和交往的群体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对于研究十七世纪文化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M].北京:三联书店,2015.
- [2] 薛龙春.郑篁研究[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7.
- [3] 朱彝尊.曝书亭全集[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4]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 [5] 张宗友.朱彝尊年谱[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 [6] 余英时.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A].余英时文集(第二卷)[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7]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 朱彝尊.静惕堂词序[A].引自严迪昌.清词史[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 [9]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10]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1] 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22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张玉璞

Zhu Yizun and the Stele Visiting Movement of the Early Qing Period

WANG Shen

(Museum of Art and Archae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the upheaval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had greatly affected the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of China; new methods and theories appeared consequently. Featuring epigraphy and textual research, shixue, or practical learning, flourished; visiting steles on historical sites became popular in the elite class. The famous scholar Zhu Yizun (1629—1709) was one of the advocates of this movement, and the inscriptions acquired from the stele visiting became important sources of his epigraphical studies.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colophons and poems recorded in the Pushuting ji by Zhu Yizun and relevant documents, this essay relates Zhu's activities in the Stele Visiting Movement and explores some new methods and concepts attempted by the early Qing scholars.

Key words: Zhu Yizun; epigraphy; stele visiting; textual research; Pushuting ji